绪　言

孩提之时常听父兄们叹息：“中国像‘一盘散沙’!”这句话犹如一块石头,投入我平静的脑海，不时掀起困惑的波浪，一直回荡未平。长大以后学了中国近代史，才知道100多年前，西方列强以形形色色的“重炮”，摧毁了东方民族的“一切万里长城”，而“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在这一民族竞争中，中国虽几经拼搏，然却败下阵来，逐渐沦为外国列强的半殖民地，以致四分五裂，国将不国，于是父兄们才有“一盘散沙”的感慨。这是历史的事实，更是历史的遗憾，我辈无须忌讳；然而这还不是历史的全部，有一个更重要的历史事实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被外来的民族所征服，就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沦为半殖民地的苦难岁月里，我们民族也还没有完全丧失独立国家的地位；这是因为中华民族从她诞生之时起，就逐渐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而使自己始终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克服种种内在的与外来的离散力的艰苦历程中，在新生与腐朽，先进与落后，统一与分裂的竞争与角逐中，沿着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时而停滞、时而跳跃的运动轨迹，迂回曲折地发展起来，而汇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至于斯。

近年来，广东省发起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并组织广东省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先后举行了多次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研讨会，陆续出版有关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专著和论文集。这是很有意义的，实是有识之举。在当今“西方纷扰，东方宁静”的世界形势下，中华民族大团结不仅是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的重要保证。而寻求与认识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认同感，对于实现民族大团结，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通过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还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去反观中国古代文明，开拓研究中国历史的新领域，开辟探索中华文化的新途径，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中华新文化，塑造中华民族独特的新品格、新风貌、新精神，其意义是异乎寻常的。

何谓中华民族凝聚力？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持说颇多，其理自成，见仁见智，各有千秋。我以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指的是中华民族融合、内聚和凝结的一种社会力量，也是维系与推动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它的构成是多元的，包括地缘、血缘、语言、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和文化心理等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因素。翦伯赞说：“经济是历史的骨骼，政治

是历史的血肉，文化艺术是历史的灵魂。’[①]民族凝聚力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基础是社会经济，核心是国家政权，而它的灵魂是与世界上其他民族迥异其趣的中华民族精神，而地域、血缘等自然因素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我们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构成中，涉及到民族素质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问题。所谓民族素质，就是民族的人口素质、文化素质、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心理素质诸方面的总和。民族素质渗透于构成民族凝聚力诸因素之中，并决定民族凝聚力的结构和质量。先进的、良好的民族素质，能够促使民族凝聚力诸要素的充分发展，并可以优化诸要素的有机组合，从而形成凝聚力的合理机制，最充分地发挥民族凝聚力的整体功能；而落后的、低劣的民族素质，则会妨碍民族凝聚力诸要素的充分发展，不利于诸要素的良好组合，从而削弱民族凝聚力的整体功能的发挥。显然，民族素质是一种对民族凝聚力的结构、质量，从而对民族凝聚力的社会功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在构成民族素质诸要素中，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心理素质往往比较稳定，而民族的文化素质则是一种最活跃、最富于能动作用的要素。文化素质包括文化知识程度、道德思想水准和科学技术水平。在这里，科学技术具有最高的、首要的决定意义。恩格斯说：“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

①转引自康大川的《新编中国史话·序》，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 页。

革命的力量。’[①] 马克思甚至“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②]。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重要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为民族的文化素质，以至为整个民族素质的迅速提高创造了条件。因此，民族凝聚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或者说，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民族凝聚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增强民族凝聚力，首先必须优先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三大部类，任何忽视社会科学在提高民族素质从而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观点，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和有害的。

民族与民族凝聚力是不可分割的。民族凝聚力存在于民族机体之中，离开民族的机体，凝聚力就失去自身之所倚托而烟消灰灭；民族如果没有凝聚力，它也会变成一具没有血脉和生命的僵化了的木乃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这么说，民族与民族凝聚力是一对同时降临人世的孪生子。50 年代，史学界曾就汉民族形成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但由于那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起源理论知之未深，识之肤浅，人们衡量民族的标准，往往停留在斯大林对于民族的定义上，而斯大林认为民族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历史上只有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并断言“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5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72 页。

民族的’[①]。在这里我们无意对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去作全面的评说，我们只想说，斯大林对于民族起源的见解，是以俄罗斯民族的发展状况，或者加上欧洲一些民族的历史过程为根据的。他的见解自有其理论与实际的意义。但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套用斯大林的意见来否认世界上其他地区资本主义以前民族普遍存在的历史。其实，经典作家曾经多次指出过资本主义以前也有民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原始社会就有民族，称之为“原始民族”。在《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一文中，恩格斯又说：“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上的原始民族的社会制度，在其基本特征上，是多么相似，甚至相同。’[②] 人类跨进文明时代的门槛以后，“由于生产力太低，每个人不是奴隶，就是拥有奴隶”[③]，因而出现奴隶制民族。后来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先后取得支配地位，“农民的民族”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也随之出现于世。[④]依据经典作家关于民族起源与发展的理论，结合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我们以为中华民族凝聚力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古代历史上先后经历过奴隶制与封建制两个发展阶段。具体地说，中华民族凝聚力渊源于以炎黄部落集团为代表的原始部落时期，发端和形成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秦汉，发展、壮大于隋唐，而最终稳固地确立于明代与清中叶。纵横千万里，上下五千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1卷，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第 289页。

②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资本主义以前存在民族的论述，除上引文字之外，还有多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也说“: 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10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年，丰富多彩而统一，悠长久远而不断，在世界历史上独放光芒。

为什么中华民族凝聚力能够长久不断地自存、自强于人类历史上？眼下，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华优秀文化、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长久存在、不断发展的动力。我以为此说并不十分确切。尽管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曾经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但是维护与推动中华民族凝聚力长久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动力和原因，最重要的还不是“精神动力”，而是民族的共同利益。因为经济关系是民族关系中最本质、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而经济利益则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① “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种族本身是一种经济因素。”② 马克思更明确指出：“在古代，每一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各个部落的敌视等等）而团结在一起。”③ 也就是说，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原因，即民族凝聚力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是该民族的“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亦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每一个民族内部合理、正当的物质利益分配格局，正如张岱年所说的：“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基础即是这个民族的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惟有民族的整体能保障这个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才能形成这个民族的凝聚力。”④ 中华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53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0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第 169 页。

④张岱年：《爱国主义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载《光明日报》 1993 年 8 月 1 日。

族存在与发展的过程主要是在封建时代，因之探讨中华民族凝聚力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就应该从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条件、物质关系中去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与欧洲中世纪实行农奴制和分封制不同，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实行了租佃制和中央集权制，这就避免了西欧中世纪农奴制的地位以“主人底阶位为前提”① 和领主个人拥有行政、司法乃至军事权力的小邦林立的状态，从而抑制了贵族、官僚个人权力的恶性膨胀，相对减轻了劳动者对地主个人的人身依附关系。显然，这种情况比较有利于维持中华民族内部各个利益集团“各种对立利益之间的平衡”②，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内部利益分配格局的稳定，从而维护和推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存在与发展。③

多年前，学术界曾经争论过什么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内部各族关系的主流。一种意见认为，平等联合、友好往来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主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平等、友好不可能成为民族关系的主流，长期隔阂和互相压迫才是阶级社会民族关系的主流。笔者以为这两种意见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未免都有偏颇、肤浅之嫌。是否可以换一个视角来审视和探讨这一问题呢？经过多年的思考，笔者认为是可以的。平等联合、友好往来和长期

①马克思认为西欧中世纪的领主制以“主人底阶位”为前提，在那里，“土地显得像它的主人底非有机的身体”。见《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6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0页。

③ 参见彭年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中两个理论问题的商榷》，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隔阂、互相压迫是中华民族内部民族关系历史上常见的两种历史现象，各族之间相互关系的主流存在于上述两种历史现象之中。通过对两种历史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平等联合、友好往来或长期隔阂、互相压迫，都不可能单独成为中华民族关系的主流，而中华民族内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融合、内聚与凝结才是历史上中华各族关系的主流。或者说，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内部各族在和睦共处、友好往来和矛盾冲突甚至互相攻击的历史过程中，互相交流、互相依存、互相吸收，逐步打破民族隔阂，减少民族差别，加强民族联合与合作，克服种种离散力与分裂现象，从而增进中华各族的融合、内聚与凝结，逐步形成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共同缔造多民族统一国家。简而言之，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族关系的主流。而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各族融合、内聚与凝结的方式，包括通关市、通婚、“胡人”内迁、汉人南流、“胡”汉杂居以及开发边疆、抵御外患等等，更是丰富多姿、纷繁多彩的，其影响十分深远，后世受益不尽，时至今日我们犹承其遗泽。

前面我们提到，秦汉时期，即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起，至公元 220 年魏文帝曹丕代汉为止的 440 年间，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定型期。为什么说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定型期？这不仅是由于这一时期是政治空前统一集中，经济发达繁荣，文化昌盛活跃进取的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诸多重要特征，在这一时期已经明朗地显示出来。几千年来支撑着巍峨壮观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大厦的物质基础，是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而这种小农经济的最后确立和充分发展过程的第一个高潮的出

现，就是在秦汉时期。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化格局，也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说：“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① 近代著名思想家谭嗣同也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② 毛泽东更写了“千载犹行秦制度”的著名诗句。这说明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等级名分、贫富贵贱为原则的古代中华民族凝聚力机制，确立于秦汉时期。至于以无神论为特色的伦理型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灵魂的形成，以及中华民族凝聚力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辽阔广大的国家疆域的初步奠定和聚族而居的居住格局的确立，也同秦汉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因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诸多特点在秦汉时期已经初步形成，这一时期在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史上处于上承殷周、下启隋唐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以致人们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及历史上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诸多问题，都要追溯到秦汉。显然，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定型期。

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历史范畴。今天的民族凝聚力是历史的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为了深化和加强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总体认识，就必须认真研究民族凝聚力的全部发展过程，而探讨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定型期的秦汉 440 年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特别的意义。基于上述的认识，笔者不揣谫陋，乃撰成《秦汉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一书。

本书对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试作初步的探讨，分六章

① 《日知录·秦纪会稽山刻石》。

② 《仁学》，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47 页。

述论，开篇是绪论，谨就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粗浅的看法，亦是本书的指导思想。第一、二章探讨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头和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状况，提出并论证中华民族凝聚力起源于原始时代末期而形成于夏商周三代，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定型期。第三、四、五章从统一国家、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与民族凝聚力的相互关系，进行审视、分析和概括，以期进一步获得某种概括性的认识。第六章考察秦汉中华民族凝聚力在中国历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即从探讨汉族的形成、封建制的确立和伦理型文化的建构等对后世的影响，进一步论证了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奠基时期。

笔者虽多年致力于秦汉史的学习和研究，但由于学识的限制，所获不多，所识浅薄，特别是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个新课题的研究，更是刚刚起步。本书所论，只能说是笔者探讨这一新课题的尝试，其中间有创获，亦集众家之长以启己说而已，且论之所及，未必能言中肯綮，聊以献曝罢了。至于错漏、偏颇之处，实难避免，幸希读到此书的良师益友，多多赐教是荷。另外，本书征引前贤师友的见解、资料，尽可能注明出处；为便于行文起见，对所引文字的作者，一概不避名讳，不加尊称，尚祈鉴谅为盼。

当我两年多来在灯光之下时断时续地撰写此书而今即将搁笔之时，一丝轻松，一丝疲惫，夹着一分莫名的惆怅袭上心来。古人曰：“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①] 我衷心地期望着师友们的批评指教。但愿此书作为引

① 《荀子·修身》。

玉之砖，引来朋友们的真知灼见，亦望此书能成为自己继续努力的起点，今后在学术上有所进取，有所收获。倘若如此，就是最大的回报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起源

中华民族凝聚力存在于中华民族机体之中，没有凝聚力就不可能形成民族，离开民族机体，凝聚力就失去自身之所倚托而消失。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定型期，而秦汉民族凝聚力是从先秦时期，乃至史前时期萌发和演变而来的。因此，探索秦汉中华民族凝聚力，就应该追溯历史发展的踪迹，从认识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起源和发展的状况入手。

第一节　中华民族的最早先人

全世界公认,中华民族是一个源远流长、

根深叶茂的伟大民族。但是，它的根源究竟何在？关于这个问题，过去长期存在着外来说和本土说的争论。① 近半个世纪，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辽阔广大的中国疆域之内的主人，是东亚大陆上土生土长的民族； 1260 多万平方公里② 的中华大地，是世界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中心之一；早在二三百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最早先人就已经劳动、生息和繁殖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之上了。

我们中华民族居住的地方，坐落在亚洲的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临太平洋，北达大沙漠，南至南海诸岛。在这一片幅员辽阔的大陆之上，地势西高而东低，大致呈阶梯状分布：

①中华民族是东亚平原上土生土长的民族，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但自明朝末年以后，与欧洲人东来相配合，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中国人种西来说”。法国人拉克伯里以中国历法、汉语中某些名词的语言、中国人尊右的习惯和小麦种植等与巴比伦人有相类似之处，便断言中国人种来自巴比伦。瑞典人安特生则以河南仰韶、甘肃各地出土的彩陶类似于俄属土耳其斯坦和波斯某些地方发现的彩陶，尤其和南俄出土的彩陶最像，遂又以土耳其斯坦为中国民族的原住地。另外还有一些西方学者掇拾中华民族一二细小征象，与其他民族相比附，从而断定或出于埃及，或来自中亚，或谓自中南半岛移来，甚至认为自北美西渡。日本某些学者亦不甘示弱，根据我国古代神话和小说的描述，称庖牺和少昊皆建国于“华胥之州”，而谓中国人来自日本，从而臆造了“中国人种东来说”。上述“西来说”“东来说”，皆产生于外来民族入侵中国的历史背景之下，其意图和观点之错误，是不言而喻的。此说提出之后，已受到中外学者的批评。参见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第三章第二节，商务印书馆 1939 年出版，1993 年影印版。刘岱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永恒的巨流》第 128 - 129 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3 年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 1991 年第 1 版。

②过去说中国国土的面积为 960 多万平方公里，这是不准确的。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我国海域扩大了 300 万平方公里，因此我国国土面积应为 1260 多万平方公里〔《重新认识我们的国土》，载《光明日报》 1996 年 1 月 4 日。

西南部是海拔 4000 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从青藏高原往北、往东，到大兴安岭一太行山一巫山一云贵高原东坡，地势明显下降到海拔 1000 - 2000 米；再往东，主要是丘陵和平原交错的地区，海拔在 500 米以下。

在这一西东落差显呈三级阶梯的大地上，形成了千姿百态的生态环境：有广阔的平原沃野，有众多的江河湖泽，有峰峦高耸、地面崎岖的丘陵，有凹凸不平、形态如锅的盆地……各种地形交错分布，给先人们以优越丰润的条件和严峻艰难的环境，中华民族就在这个天生的自然框架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中华民族的最早祖先，可以追溯到猿人时代。① 他们的后代在漫长的岁月里，先后历经过古人（早期智人）和新人（晚期智人）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多种地方性文化区。在夏、商、周三代，分居于中华大地上四面八方的多种文化区的人群，以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凝聚成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这个多元一体的民族集团，并与居住于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四夷”不断融合，结成了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和血缘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凝聚成更高层次、更多人群、更大空间的多元一体化民族集团——中华民族。

距今 170 万年的元谋猿人，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这是

①在猿人时代以前，我国境内还有一种“正在形成中的人”在活动，他们属于腊玛古猿类型（最初发现于印度）。20 世纪 50 年代，在云南开远发现了五颗属于腊玛古猿的牙齿化石，距今 1000 多万年前。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在云南又发现了一个距今 800 多万年的腊玛古猿的头盖骨和下颌骨化石。他们还不是人，而是一种古猿，是“人类的前驱”。

近二三十年来形成的共识。[①] 1987 年 3 月，云南省联合考古队在元谋地区又发掘出古人类牙齿化石 41 枚，还找到了以三趾马为代表的动物群、骨器等化石。考古队将这次发现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命名为“东方人”牙齿化石。专家们认为，“东方人”牙齿化石距今 250 万年，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原始的人类牙齿化石；“东方人”牙齿化石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乃至世界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的重要缺环，而且将我国人类历史至少推前 80 万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是 250 万年前生活在云南省元谋地区的“东方人”。[②]

蓝田猿人是继“东方人”之后，生活在我国境内的旧石器初期的原始人群。这是 1963 - 1964 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的，有头盖骨、上下颌骨、三颗牙齿和石器、动物的化石，距今大约 65 ～100 万年前。[③]

在中华民族的远祖中，1927 年首次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北京猿人是举世闻名的。几十年来经过多次大规模的发掘，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属于 40 多个

① 1956 年，在云南省元谋县发现了两颗猿人的门齿化石。后来又发掘出旧石器、带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片和用火的灰烬。这里的猿人，被称为元谋猿人，当时认为这是最早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原始人类。

② 《元谋地区古人类考古发掘获重大成果》，载《光明日报》1987 年 4 月 6 日。另据《文汇报》1987 年 9 月 26 日报道，云南元谋小河村蝴蝶梁，还发现了一段直立人左股骨和一些早期旧石器，暂定名为“蝴蝶人”。初步测定，“蝴蝶人”距今 400 多万年。此发现如若得到确认，那么不仅中华民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 400 万年前，而且人类起源超过 400 万年的推测亦可以得到证实。

③头盖骨发现于蓝田县王公岭，据古地磁测定是 100 万年前的人类化石。下颌骨是在陈家窝发现的，距今约 65 万年。

个体的头盖骨、面骨、下颌骨和四肢骨等大量化石，十多万经过人工打制的石器和一百多种动物化石，还有用火的遗迹。经古地磁测定，北京猿人距今约 69 万年。①

北京猿人的体质形态已经具备了人的基本特征，身材较矮，男子平均身高约 1.62 米，女子 1.52 米。由于长期的劳动，上肢骨最发达，双手可以完成复杂的动作，变得越来越灵巧，下肢骨也与现代人相似。表明他们已经能够直立行走，只是还有点儿屈膝。头部带有较多的原始性。② 对脑膜上语言区部位隆起的分析，可以知道他们已有简单的思维和能发出分节的语言。北京猿人身体各部分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进一步证明了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③ 的科学真理。

继北京猿人之后，我国境内又有 11 个新的猿人化石地点被发现④。这些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存的出土表明，从远古洪荒时代起，中华民族的最早祖先的足迹，就已经遍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乃至东北南部的广大地区。中国古人类专家们认为，我国境内不同地区出土的猿人化石和旧石器工具，虽然有不少差异，但存在许多共同点，主要有铲形门齿，石器以单面反向修理居多，工具组合以刮削器为主，兼有

① 马醒华等：《古地磁与旧石器时代考古》，载《考古》1978 年第 5 期。

② 如头盖骨低平，前额向后倾斜。眉骨隆起，左右相连，呈屋檐状。鼻子宽扁，颧骨高突，吻部前凸，下颏后缩，牙齿粗壮。脑容量平均 1059毫升，小于现代人（1400毫升）而大于类人猿（415毫升）。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08 页。

④ 这 11 个出土猿人化石和文化遗存的地点是：辽宁营口金牛山，山西垣曲，陕西潼关，河南三门峡，河南召县云阳镇，安徽和县龙潭洞，湖北郧县梅铺，湖北郧西县白龙洞，湖北大冶石龙头，贵州黔西观音洞，贵州桐梓等。

尖状器和砍砸器等①。特别是铲形门齿，更是我们中华民族体质形态的首要特征，早在 170 万年前，元谋猿人的两颗上内侧门齿，即已呈铲形构造②。所谓铲形构造，是指上颌的两颗中门齿的形态，好像小铲子。这一体质特征，在现代中国人身上特别突出地表现出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中华民族是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于中华大地上的古老民族，所谓中国人种西来说、东来说云云，实属捕风捉影、主观臆测的无根之论。

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③ 中国境内不同地区猿人化石的发现，证实了中华民族祖先悠久的历史，但是，刚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先民，依靠粗笨的石器和木棒从事生产，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极其艰苦的。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单独的个人不可能生存，只有“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④。在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生产劳动中，人们在统一的指挥下，集体出猎，共同采集，实行简单的协作，去完成一个人所不能进行的生产活动；得来的食物平均分配，共同享受；为了发泄性欲和繁殖后代，男女之间实行自然交配，在习俗上最初没有什么限制，后来才逐渐排除异辈男女的乱婚（杂交）现象。这样，生产的需要，共同的利益和血缘的联系，产生了一种群团凝聚力，从而造成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组织——血缘家族的出现。马克思指出：“一俟原始群团为了生计必须分成小集团，它就不得不分成血缘家族，

①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古人画集·前言》，中国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 页。

② 胡承志：《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载《地质学报》1973 年第 1 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5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9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